

滁州市出土南宋铁钱的研究

滁县地区钱币学会筹备组 章书范

近年来,安徽省滁州市曾两次发现密藏的南宋铁钱。我们对这些铁钱进行清理,并作了些粗浅的研究,现将这些资料整理出来,旨在抛砖引玉,企望引起泉界对研究宋代铁钱的关注。

一、铁钱的出土情况

一九八三年十一月,在滁州市南郊师专校园的基建施工工地,于距地表一米深处出土了一批铁钱。这些铁钱出土时铸结成一团,约有十多公斤,一千余枚。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残片,可看出这些铁钱是盛放于陶器中密藏的,因埋藏年久,容器破碎,终致铸结成团。

一九八四年四月,滁州市北郊北安生产队又发现一批铁钱,是一农民挖土时于距地表40厘米处挖出的。共三十多公斤,四千余枚。出土时还可见规则地成串叠放于土坑中,铁币沾叠在一起,穿带已腐烂不见,铁钱上还沾有石灰的痕迹。

这两处出土铁钱均因腐蚀严重,其中大部分腐烂残破,难辨字迹,仅清理出321枚钱文清晰可辨。经考证除一枚北宋铁钱外,余皆为南宋铁钱。

二、出土钱币概述

北宋铁钱为徽宗朝的大观通宝折三钱,仅此一枚。瘦金体、对读,钱径约31毫米,穿宽8毫米,重约9.5克。

南宋铁钱有高宗的绍兴、孝宗的乾道、淳熙,光宗的绍熙,宁宗的庆元、嘉泰等年号钱。除一枚绍熙通宝小平钱外,其余都是折二钱。钱径都在27毫米——28.5毫米——30毫米之间,穿宽

约6——7.5毫米,重约6——7.5克(因部分钱币锈蚀严重,其大小、重量仅可作参考)。介绍如下。

高宗朝的钱有:

绍兴通宝(1131——1162年)楷书对读、光背,仅见一枚。

(图1、2)

孝宗朝的钱有:

乾道元宝(1165——1173年)共16枚,有篆、楷两种书体,背文有纪监文字、月文、光背等式。

1.篆书旋读,光背。

2.楷书旋读、光背。与上枚成对。(图3~6)

3.楷书旋读、背穿左楷书“同”字。同字纪监,即舒州同安监所铸(属淮南西路,今安徽潜山县境)。

4.楷书旋读,背穿左楷书“松”,穿下“~”。“松”字纪监,即舒州宿松监所铸(属淮南西路,今安徽宿松县境)。

5.楷书旋读,背穿下楷书松字。又有背穿下“~”者。(图7~10)

《南宋泉谱凡例》文曰:“至乾道钱乃于钱背铸有监名一字,松为舒州宿松监,同为舒州同安监……”。其实,南宋钱背文纪地并非始于乾道。高宗的建炎小平铜钱背文有“川”字者,为四川所铸;绍兴铁钱背文有“利”字者,为利州绍兴监所铸。不过从乾道始,铁钱倒是广泛地采用了背文纪地的形式;以后的南宋铁钱多沿用此例。

淳熙元宝(1174——1189年)共74枚,有阔缘、狭缘两种,文有篆、隶、楷三种书体,分旋读与对读,字体又有大小之分。背文有篆、隶、楷三种书体,分旋读与对读,字体又有大小之分。背文有篆、隶、楷三种书体,分旋读与对读,字体又有大小之分。背文有篆、隶、楷三种书体,分旋读与对读,字体又有大小之分。

1.狭缘楷书、旋读。背穿上楷书舒字,穿下同字,有“穿左”(“~”)和穿右“(”两种。背文为地、监并纪,即舒州同安监铸。

2.狭缘楷书、旋读。背穿上楷书舒字,穿下松字,也是既纪

铸又纪监，为舒州宿松监铸。

3. 狭缘楷书、旋读。背上一字似春字，穿下“一”、疑为舒春监所铸（属淮南西路，今湖北舒春县境）。（图11~16）

《永乐大典·宋史》曰：“淳熙元年铸钱，文曰淳熙元宝，有小钱，有折二，真、篆书，凡五等。背文有泉字者，有星月者，又有舒、同二字者。七年后因整顿者多，遂令诸监逐年于背文上铸年数以别之，其弊遂止……”。①可知以上三种均为淳熙七年以前所铸。

4. 狭缘楷书、旋读。背穿上同字，穿下有“捌、九、十一至十五”几种，为同安监淳熙上述各年所铸。其中十一至十四数字叠书，十五横书。（图17—20）

“从淳熙七年起，在钱背铸明年份。如淳熙七年的钱在背上铸一“柒”字，八年铸一“捌”字，都是大写，九年以后改为小写，到十六为止。”②淳熙元宝铜钱均用此例。同安监所铸铁钱也遵照了此例。

5. 狭缘楷书，旋读。文字笔划较细，“熙”字的写法带有浓厚的行书风格，其“已”旁的“乚”带有回峰，许多笔划作连笔书，与上述诸品楷书的书法截然不同。背穿上松字，也有行书风味，穿下九字，应是宿松监淳熙九年铸。可见宿松监所铸淳熙元宝铁钱也和同安监一样，其纪年文字九年以后改为小写。（图21—22）

6. 狭缘篆书、旋读。面文为典型的篆书，背文却为楷书。穿上春字，穿下玖字，为舒春监淳熙九年铸。据《古钱大辞典》文载：淳熙元宝铁钱背文还有“春拾”字样的③。看来舒春监所铸淳熙元宝铁钱，并未遵“九年以后改为小写的”例子。（图23、24）

7. 阔缘篆书、小字旋读。背文竟漫不清，不知何监、何年所铸。

8. 阔缘篆书、小字旋读。背文却作楷书。穿上春字，穿下捌

字，舒春监淳熙八年铸。

9. 阔缘楷书，小字旋读。背文不清，似光背。

以上三种阔缘铁钱都是《古钱大辞典》钱图中未曾收录的，它们又略呈差异。篆书的字体较大，隶书的穿较广，楷书的缘最阔，达4毫米。（图25—30）

淳熙通宝共49枚。钱文仅楷书一种，分旋读与对读。背文有春、同两监名及纪年文，分列于上下、左右。形制大小与淳熙元宝同。

1. 楷书旋读。背穿上春字，穿下有十一至十六几种，分别为舒春监十一至十六年所铸。其中十一、十二两字叠书，十三至十六两字横书。（图31—34）

2. 楷书旋读。背穿上春字，穿下“十二下”三字，“十二”二字叠书于右，当为纪年数，“下”字列于左，其意究竟何解？（图35—36）见南宋钱中，理宗端平年间在四川铸有端平元宝、通宝大铁钱，背文有“监名和东南西北以及上下和数目字等相符合”的，有人认为这是纪钱炉方位④。此说是否可信姑且不论，但笔者认为此枚淳熙通宝的“下”字却不作纪炉方位解。一是淳熙钱背文除“下”字外尚未见其它方位词，象东南西北上中等，二是仅十二年所铸的淳熙通宝背文有“下”字，在此前后均未见背文有“下”字或其它方位词的。因此，可以被想“下”字与当时的铸币情况或相关。

又见倪模之《古今钱略》文曰：“史志称淳熙十二年，诏舒舒铁钱并铸五万贯以淳熙通宝为文。则政通宝在十二年矣。乃通宝钱有十一字同字平列，自十一至十六共铁钱五品。”⑤倪氏因此而认为政通宝在十二年，实是误解。就连他自己也发现“通宝钱有十一字同字平列的”（即同安监十一年所铸背文横列于穿下左）上述淳熙通宝中已有背文作“春十一”的，可见淳熙十一年舒舒二州就已铸有通宝钱，可能当时就改铸通宝钱而下诏一事为史志遗漏。上述诏书的“以淳熙通宝为文”只不过顺带一提，可

视作“仍以淳熙通宝为文”，而其主要内容是指“舒新铁钱并增铸五万贯”一事。可以认为，新嘉祐十二年所铸的通宝钱背文的“下”字与增铸一事有关，可能为了计数的方便，新嘉祐在铸造增铸的那部分淳熙通宝时，于背文加铸了一个“下”字，以便与按原铸额所铸的“春十二”通宝钱相区别。因此，“下”字的含义可理解为“下一批”（即增铸钱）之意。至于舒州同安监是否也采用了此例尚未可知，期待于今后的发现。

3. 楷书旋读。其中“熙”字的书法有行书风格。背文横列，穿右同字，穿左十六二字叠书，舒州同安监淳熙十六年铸。（图37—38）

4. 楷书对读。背穿上春字，穿下十二字叠书。共发现4枚，均为新嘉祐十一年所铸。（图39—40）

光宗朝的钱有：

绍熙元宝和绍熙通宝（1190——1194年），元宝共83枚，钱文全为楷书旋读，字体分大小两型，其中小字型共79枚，占元宝总数的95%以上，背文有同、春、汉等监名及纪年文，通宝共13枚，有篆、楷两种书体，分对读与旋读，背文有同、春、汉、定等监名及纪年文，直列、横列于钱背。另有1枚小平钱。

1. 绍熙元宝大字型。钱径也较大（30毫米），钱身较薄（郭厚1.8毫米），重7克。背穿上同字、穿下元字，另有穿右同，穿左二的，同安监绍熙元年、二年所铸。（图41—42）

2. 绍熙元宝小字型。钱径较小（28.5毫米），钱身较厚（郭厚2毫米），重约6.5克。背穿上同字的穿下有元、三、四、五几种，背穿上春字的穿下有元、三、四、五几种，背穿上汉字的穿下有元至五五种。汉字纪监，即汉阳军汉阳监（属荆湖北路，在今湖北汉阳境）。绍熙共五年，同安、新嘉祐两监未见二年所铸钱，史载“绍熙二年减新嘉祐、同安两监岁铸各十万贯”^⑥故两监二年钱较少。（图43—46）

3. 绍熙通宝，篆书对读。背文也作篆书、穿上春字，穿下

二、三两种，新嘉祐绍熙二年、三年所铸，另一种穿上篆书“定”，穿下三，定字纪监，即光州定城监（属淮南西路，今河南潢川县境）^⑦绍熙三年铸。（图47—49）

4. 绍熙通宝，楷书对读。背文楷书，有穿上同穿下三者，穿上春穿下二者，穿右汉穿左三者。分别为同安、新嘉祐、汉阳三监绍熙二年、三年所铸。（图50—52）

5. 绍熙通宝，楷书旋读，仅见一枚，背穿上同，穿下三，同安监绍熙三年铸（图53—54）

6. 绍熙通宝小平钱，楷书对读。仅发现一枚。背穿上春，穿下二，新嘉祐绍熙二年铸。（图55—56）

宁宗朝的钱有：

庆元通宝（1195——1200年）共62枚，钱文仅楷书一种，分旋读与对读，文字仍有大小之分。背文有同、春、汉等监名及纪年文。

1. 旋读大字型。背穿上春字，穿下有二、三、四几种，为新嘉祐上述各年铸，背穿上同字，穿下五，同安监庆元五年铸。（图57—58）

2. 旋读小字型共56枚，占庆元钱总数的90%以上。背穿上同字，穿下有元至五几种，分别为同安监庆元元至五年各年所铸，背穿上春字，穿下有二至六几种，分别为新嘉祐庆元二至六年各年所铸，背穿上汉字，穿下有元至七几种，分别为汉阳监庆元元至六年各年所铸（图59—62）

庆元只有六年，为何有“汉七”之庆元钱？据《古钱大辞典》引文：“宁宗本纪，庆元六年十二月癸卯，诏改明年为元年，而钱文有春七、同七二种。何梦华曰此六年预铸也。”此说可信，但未提及汉七钱。《南宋泉谱凡例》说：“……新嘉祐、汉阳两监仍遵向年之例，铸出背七之钱。”^⑧又未提及同安监。可见同安、新嘉祐、汉阳三监在接改元之诏前均已预铸有“七”字纪年钱。

3. 对读小字型。背穿上篆字，穿下有元、二两种，为嘉泰监庆元元年、二年所铸。（图63、64）

嘉泰元宝和嘉泰通宝（1201—1204年）。钱文全为楷书，文字的大小、书法已较统一。元宝共5枚，仍分旋读与对读；通宝共17枚，全作对读。背文有同、春、汉等监名及纪年文。钱的大小也较统一。直径均为28.5毫米，穿宽6.5毫米，郭厚2毫米，重7克。

1. 嘉泰元宝，旋读。背穿上同字、汉字两种，穿下均为元字，分别为同安、汉阳监嘉泰元年铸。其中同安监所铸一枚，钱面穿左上角有一星点，背文同元。《古钱大辞典》钱图曾引一钱面穿右上角有一星点者，背文也为同元。（图65~68）

2. 嘉泰元宝，对读。仅见1枚；背文春字，嘉泰监嘉泰元年铸。（图69~70）

3. 嘉泰通宝，对读。背穿上同字，穿下有元至三三种，同安监嘉泰元至三年各年铸；背穿上春字，穿下有元、二两种，嘉泰监嘉泰元年、二年铸；背穿上汉字，穿下有二、三两种，汉阳监嘉泰二年、三年铸。其中汉阳监二年所铸的一枚钱面穿左下角有一星点。（图71~75）

同安、嘉泰、汉阳三监所铸嘉泰元宝共发现5枚，纪年文全是“元”字，见《古钱大辞典》所录精品，同春汉皆有，且有小平钱。纪年文也仅元字一种，可见嘉泰元年时还是元宝、通宝并铸，二年以后，为使铁钱版式更统一，不铸元宝而仅铸通宝一种，与嘉泰铜钱相同。又“嘉泰三年七月壬午，权罢同安、汉阳、嘉泰三监铸钱”^①。直至“开禧元年六月壬寅，复同安、汉阳、嘉泰三监。”^②故同、春、汉三监均无嘉泰四年钱。

三、对南宋铁钱的几点认识

滁州市出土的南宋铁钱，有许多品种是古钱大辞典所未曾收录的，有些钱品虽有传闻而未见实物，这些出土铁钱为研究南宋

货币制度及南宋铁钱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。仅就管窥所及谈几点看法，拙见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，正确与否还有待于今后的发现，现先行就教于集界。

1. 南宋铁钱的品类极繁杂。从钱面特征看有阔缘、狭缘，每种年号又有元宝、通宝；钱文有直读、旋读，大字、小字，篆、隶、楷等不同书体；从钱背看有光背、星月，有纪地、纪监、地监并纪、纪年，纪年文又有大小写之分，背文又有直列横列之别。从滁州出土的铁钱看，仅南宋折二钱319枚就分出了90多种不同样式。其实这仅涉及南宋的六个年号和部分钱监，四川及其它各监所铸尚未包含在内，南宋铁钱的品类繁杂可见一般。

2. 滁州出土的铁钱涉及同安、宿松、嘉泰、汉阳、定城五监，其中宿松监淳熙十年并入同安监，^③定城监所铸仅见一枚，余都是同、春、汉三监所铸。这三监所铸铁钱主要流通于两淮荆湖一带，似乎自成体系，与四川的利、邛、嘉等州各监所铸铁钱有别。同、春、汉三监所铸以折二钱为主，小平钱较少，和南宋铜钱的情况一样；四川铸监则另有折三、折五、当十、当二十、当百等多种面额，背文还有纪值、纪炉次、纪钱炉方位等都是前者所没有的。两者宝文也不尽相同。同、春、汉三监庆元钱没有元宝，可能是为避“元”字重复之嫌，而四川所铸则元宝、通宝皆有；嘉泰二年以后直至开禧年间，同、春、汉等监只铸通宝，而四川所铸嘉泰、开禧铁钱却只见元宝，似乎两者有意互相区别。至于嘉定铁钱的十几种宝文，都是四川所铸，同、春、汉三监却未见此例。

3. “北宋的钱风，只维持到淳熙六年。淳熙初年的钱还有对钱，但自七年起就统一书体，一直到南宋末年。”^④这一说法只限于南宋铜钱，而铁钱则另当别论。从同、春、汉等监所铸铁钱的情况看，错综复杂的版别及多种书体一直维持到绍熙年间，尤以淳熙铁钱为最，直至庆元时才再未见有多种书体出现，同时背文也统一为直列的形式。但庆元钱的文字仍有大小之分。到了嘉

泰年间钱文才不再分大小，秀丽的宋体字也更显得统一、匀称。嘉泰二年后，钱文又统一为通宝一种，和同一时期的铜钱一致，版别趋于简单统一。

4.南宋铁钱大都铸造精美，文字端庄秀丽，字口深峻，不象同期的铜钱那样文字多浅平。

5.从这两次出土铁钱的情况看，南郊出土的铁钱下限为庆元四年（1198年），窖藏的时间当在庆元四年后，北郊出土铁钱的下限为嘉泰三年（1203年），窖藏的时间应在嘉泰三年之后。宋金和议之后确立以淮河为界，但金人仍不断犯宋境，滁州地处江淮之间（时属淮南东路），是江北军事重镇，处于抗金前方。

“开禧二年（1208年），金人自清河口渡淮，遂围滁州（今江苏淮安县）。十一月乙巳金人破西和州。是月滁州（今安徽凤阳县）安丰军及边屯皆为金人所破。”^⑬其中滁州离滁州仅一百公里，两次出土钱币的下限当在这次军事入侵之前，且时间很接近，因而很可能是当时豫人为避这次战乱而埋藏的。

四、南宋政府行使铁钱的原因及其后果的探讨

1.南宋政府铸行铁钱的原因

宋代经济的发展是极为突出的，较汉、唐有很大程度的增长，南宋一代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情况，也显然比北宋时期更为发达。^⑭商品经济的发展，促使流通手段货币的需要量相应增加。然而“绍兴初岁铸才及八万贯。”^⑮南宋年铸铜钱一般不过八万贯，最多的年份也只有十六万贯。^⑯这使北宋晚期的钱荒现象到了南宋就更严重了。

造成钱荒的主要原因，一是铜产不足。铸钱既少，民间又以销钱为器谋利。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应急措施：“绍兴六年，敕民间铜器，诏民私铸铜器者徒二年。”^⑰“二十八年出御府铜器千五百事付泉司，大索民间铜器，得铜二百余万斤……”。二十九

年，令官直之家留见钱二万贯，民庶半之，余限二年听转易金银……”^⑱南宋政府除大索民间铜器，立限留现钱法之外，还大量发行纸币来代替现钱行使。当时纸币的行使已遍及东南诸路，除东南行使的会子（即京会）以外，还有“川引”、“淮交”、“湖会”等特定地区行用的纸币。大量发行纸币，需要有足够的金属货币作为现金准备，铜既不足，便依靠大量铸行铁钱作为货币的保证金。

二是钱币的外流。“绍兴和议”以后，宋金的边界设置推场，以通贸易。金人由于本身铸钱不多，主要使用流入的宋钱，采取了一些吸引宋钱的办法，故“南北贸易缗钱之入敌境者不知其几。”^⑲这是北宋时“边关重车而出”的继续。为解决这一问题，南宋政府于“乾道初，诏两淮京西悉用铁钱，荆门隶湖北，以地接襄岷，亦用铁钱”。将原在四川通行的铁钱准行到与金人接壤的沿淮诸路，并申“铜钱毋过江北”^⑳。于是，江淮之间就形成了一条纯铁钱流通区。这是宋金之间的货币斗争。滁州市出土的两起窖藏铁钱几千枚中竟无一枚铜钱，可见南宋政府“禁两淮铜钱”政策的有效。

同时，宋代的采掘冶炼手工工业规模扩大了，技术改进了，产量成倍或成若干倍地增加起来。其中铁的年产量，据外国学者估计，已达十四万吨^㉑。沿边诸路均产铁炭，这给大量铸造铁钱提供了物质条件。此外，南宋时每铸铜钱一千，成本则要二千四百文^㉒，是赔本的。而每铸铁钱十文，成本只要四文，即使铁炭贵的时候也只要六文^㉓。因此，南宋政府还可在大量铸行铁钱中获利。

2.南宋政府成功地推行了铁钱。

有宋一代始终铜、铁钱并用。但北宋时仅四川专用铁钱，陕西、河东则为铜、铁钱并行区，广大地区仍用铜钱。南宋铁钱的流通区域除四川的利州东、利州西、成都府、潼川府、夔州等路

外，又扩大到淮南东、淮南西、京西南、荆湖北等路，涉及到九个路，约占南宋国土的一半（南宋时全国共分十七路），这一区域内外又“悉用铁钱”，禁用铜钱。因此，宋朝的钱制可以说：“北宋以铜钱为主，南宋以铁钱为主”。^{②③}

金属货币是由较贵重金属充当的，我国古代钱币是以铜作为币材的。“金属货币由贱到贵，由贵到更贵是经济发展的过程，是生产力发展，财富增大的结果”。^{②④}按正常的发展趋向，我国古代货币应是由铜到银的，而由铜到铁则是一种违反规律的逆转。我国货币史上铸行铁钱也不乏其例。见于经传的最早用铁铸钱的，要算东汉初年的公孙述，他在蜀地铸五铢铁钱，“废铜钱，商货不行”。^{②⑤}南朝梁武帝普通四年也曾大量铸铁五铢钱，但大量铸造铁钱加速了钱币贬值，“所在铁钱堆积如山，物价腾贵，交易者以车载钱，不复计数，而唯论贯”。^{②⑥}造成了社会混乱。五代十国时的楚、闽、后蜀、南唐、幽州等国都铸过铁钱，但他们行用铁钱都是很短暂的，有的甚而加速了封建王朝的覆灭。而南宋政府却能行用铁钱达一百余年之久，和封建王朝共始终。宋代行用铁钱是五代的遗制，但在五代那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，宋代的铁钱却是一种正规的制度。到了南宋，这一制度就更臻完善，并成功地推行了相当长的时期。就这一点说确实创造了货币史上的奇迹。因而，研究这一问题是很很有意义的。

3. 推行铁钱成功因素的探讨。

首先，南宋政府始终将铁钱控制在一定区域内流通。如前所述，南宋政府铸行铁钱有效地控制了铜钱外流，缓和了钱荒，政府还在大量铸造铁钱中获利，真可谓一举而多得的好事。但是，封建统治者向很重视吸取前朝统治的成败经验。前朝铸行铁钱引起天下大乱的事，史籍上均有记载。对此，南宋统治者是有清醒认识的，因而始终未敢将铁钱推行到政治中心的东南。孝宗“淳熙十年九月丁亥，禁内郡行铁钱。”^{②⑦}反映了南宋统治者的

这一态度。可是宁宗“庆元三年三月癸丑，命侍从、台谏、两省集议江南沿江诸州行铁钱利害。”^{②⑧}“嘉泰元年八月丙戌，复诏侍从、台谏、两省集议沿江八州行铁钱利害。”^{②⑨}宁宗两次诏中央有关机构集议在江南行用铁钱的利弊，看来似有打算在内部推行铁钱之意。然而却始终未敢冒然行动。说明南宋政府对推行铁钱仍很慎重。不过，货币流通规律势必会冲破人为的区域封锁，铁钱也就不断地流入铜钱区。“嘉定二年八月甲子，听两淮诸州民行铁钱于沿江八州。”^{③①}对此，南宋政府也只得听便。

其次，铁钱与纸币共同流通。川引、淮交、湖会、还有所谓铁钱会子都是流通于铁钱区的纸币，这就克服了铁钱币值低，大宗交易行之不便的弊端。南宋政府设置的“内库”还起着调节铁钱与纸币的作用。当市场上纸币充斥时，内库就投放铁钱收兑纸币，以保证纸币的币值，而当铁钱过多时，又投放纸币收回铁钱。如“嘉泰二年四月丙午，出封樁库两淮交子一百万，命转运司收民间铁钱。”^{③②}

政府对铁钱的投放量也是很有节制的。“乾道八年，定江西四监铁钱岁共铸三十万贯。九年，置蕲州蕲春铁钱监，岁以十万贯为额。”^{③③}各钱监每年铸钱都有一定限额，铸额由中央统一制订。乾道六年春二月丁亥，复置舒州同安监铸铁钱。”“淳熙二年春正月甲午废同安、蕲春监。”“淳熙五年十二月辛丑，复同安、蕲春监……。”^{③④}铁钱监时兴时废，也完全根据社会上铁钱流通情况而定。

南宋政府成功地推行了铁钱制度，这对摆脱当时经济上、军事上的困境，无疑是很有助益的，符合当时的国情。但是，当时全国的币制不统一，同时使用多种货币，是货币经济不发达的表现，严格的区域性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南宋的铁钱区内也就不可能有很发达的商品经济。当然，这种后果则是只限于江南的南宋朝廷所无法顾及的了。

注:

①③⑤⑧⑩丁福保:《古钱大辞典》下编。

②④⑫⑯⑰⑱彭信威:《中国货币史》。

⑥⑪⑮⑲⑳《宋史·食货志》。

⑦本文涉及的古今地名均参见《宋史·地理志》、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、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。

①②⑬⑭⑮⑯⑰⑱《宋史本纪》

⑫⑯漆侠:《宋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》(文史知识85年2期)

⑮⑯葛伯赞:《中国史纲要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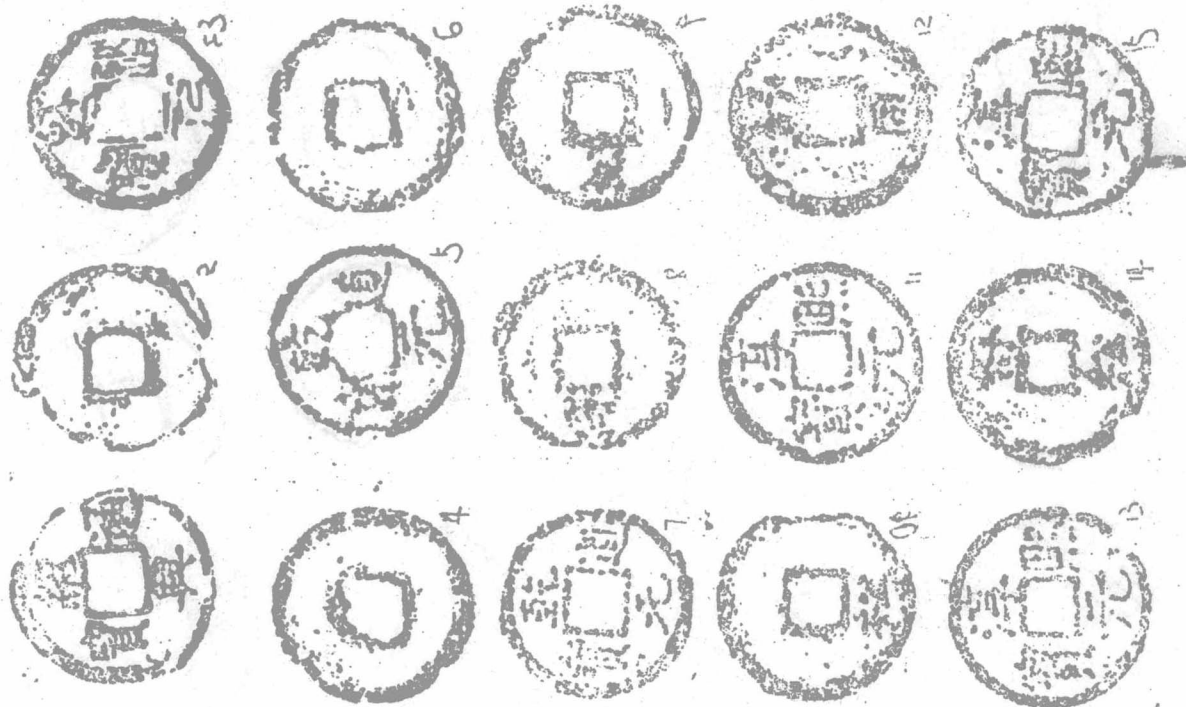
⑰⑱萧清:《中国古代货币史》。

⑲⑳潘汝瑶:《从中国货币的发展看中国经济的发展》(安徽金融研究84年3期)。

㉑千家驹、郭彦岗:《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》。

㉒《隋书·食货志》。

(转录自安徽《金融史志钱币增刊》1987年第二期56页)





32



36



37



42



55



32



35



37



41



44



31



34



37



40



43



18



2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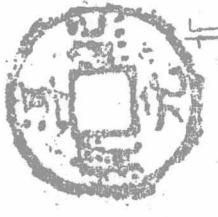
25



28



30



17



20



24



27



29



16



19



23



26



29

